

新时期我国农村第二代留守儿童 问题初探

——基于四川A村的一个社会学考察

□ 萧子扬

[摘要] 第二代留守儿童简称为“留守二代”，是指一群和父母一样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他们正在或曾经经历过父辈的留守状态。目前，我国第二代留守儿童现象初见端倪，在未来将会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亟待探讨和分析。本文重点结合实地调查、个案访谈和文献研究，尝试提出“第二代留守儿童”等概念，并认为该群体呈现出5个新特征：1. 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2. 对父母的认知偏差更为严重；3. 情感更为脆弱和敏感；4. 生存、发展环境更为多元；5. 抗逆力和赋权有所增强。提出该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有3个层次：1. 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是该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2. 阶层固化和代际循环是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3. 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和现实境遇是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留守儿童；留守二代；第二代留守儿童；农村问题；社会分层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1985年的中国还没有‘留守儿童’的概念，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外打工，不仅在父母看来是正确的，甚至留守儿童自己也觉得无可厚非”^[1]。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进而

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造成了相应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由于户籍限制、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等现实性因素的束缚，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选择将其子女留在农村，交由父母、亲人等群体照顾，最终导致和子女分离，进而产生了一个弱势群体——“留守儿童”^[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代际传递、社会流动和

分层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大部分拥有留守农村的经历，即第一代留守儿童）在成年后绝大多数会主动或被动选择和父辈一样的工作模式——进城务工，并成为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孩子呢？他们是否会再次成为留守儿童？

对于留守儿童经历的选择，存在两种可能：中断留守、继续留守。一方面，部分农民工不愿意让子女经历自己曾经承受过的童年遭遇，努力避免子女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等多重现实性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将子女留在身边，导致第二代留守儿童（留守二代）得以产生。早在2012年就有调查报告提到，“对1200多名80后、90后的外来务工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曾是留守儿童，而他们的子女已经或正在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3]。也有学者认为，受到农村流动人口代际更替和“流动—留守”家庭拆分模式的影响，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制造着新一代的留守儿童^[4]。此外，2018年7—8月，笔者在参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百名师生乡村振兴系列调查”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若干个第二代留守儿童的典型案例。可见，我国第二代留守儿童（留守二代）现象初见端倪，在未来将会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

1. 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由上官子木（1993）提出，“是指完全由祖父母照顾而父母均在国外的儿童”^[5]。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留守儿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扩展，“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的儿童”也被纳入这一范畴。尽管尚不统一，但学界主

要从年龄、父母外出数量、父母外出打工时间长短等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年龄界定曾长期存在争议，包括18岁以下、16岁以下、6~16岁、14岁以下等观点。叶敬忠（2006）、周福林（2006）等学者界定为18岁以下，刘允明（2006）、邹先云（2006）等学者界定为16岁以下，吴霓（2004a；2006b）等学者界定为6~16岁，段成荣（2004）等学者界定为14岁以下。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认同“18岁以下”这一界定^[6]。

第二，根据父母外出数量的差异可以将留守儿童分为多种类型，即“完全留守”“缺父留守”“缺母留守”等。

第三，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界定也存在分歧。一方面，大部分文章没有加以界定和操作化，通常用“长期在外务工”等词汇加以概括。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进行了界定，但差异较大。周福林（2006）、段成荣（2006）、郝振（2007）、吕绍清（2007）等人认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时间应该限定在半年以上，叶敬忠（2009）等人则认为应该限定在4个月以上。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吴霓，2004）认为时间限定没有意义^[7]。

此外，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我国有关留守儿童的政策文件在概念界定上和学术界存在一定差异。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8]。此后，民政部根据这一定义在2016年、2018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摸查，但由于定义不同，导致调查的结果和学术界的预测存在较大偏差。因此，需要对留守儿童概念加以统一，并利用历史性、发展性视角加以完善。

在本研究，留守儿童是指至少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半年以上），并留守农村交由父母单方、祖辈、他人照顾或无人照顾的18岁以下的农村儿童。当然，这一定义在未来的研究过程当中需要结合新的情况与时俱进。

2. 第二代留守儿童

第二代留守儿童也被称为留二代（留二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留学二代，另一种就是指留守二代，本文研究的是后者）、留守二代、新一代留守儿童、新生代留守儿童等（后文简称为留守二代），是指一群和父母一样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他们正在或曾经历过父辈的留守状态。留守二代现象将是未来留守儿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为新时期留守儿童研究的转型和拓展提供了契机^[9]。而且可以将留守二代的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为如下指标：18岁以下，父母至少一方曾经是留守儿童，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留守农村交由父母单方、祖辈、他人照顾或无人照顾。

二、相关文献综述

留守二代是新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本质上也属于留守儿童，并受到其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二代”的个别特征。

1. 在留守二代研究方面

目前，留守二代现象集中于新闻报道，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相关概念迟迟未被学术化。在新闻报道方面，2011年至今陆续有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佛山90后外来农工早生子，留二代诞生》（2011年）、《留守儿童恶性循环：“留一代”进程衍生留二代》（2015年）、《留守二代的野草童年》（2015）、《村小里的留守

“二代”》（2015）、《两代“候鸟”的爱与难》（2018）等。其中，李莎（2016）提到，“第一代乡村留守儿童已经流动到了城市，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父母，‘留守一代’的命运正在他们下一代身上重复上演”^[10]。林君（2015）认为，“当年不能随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现已长大成人，并且渐渐也都有了孩子。为了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旧选择了像他们的父母当年一样外出务工，把孩子留在家乡。于是，第二代留守儿童就出现了”^[11]。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及“留二代”“留守二代”“新一代留守儿童”“第二代留守儿童”“新生代留守儿童”等字样的主要有潘璐、叶敬忠（2014）、林寒（2016）、陈宝泉（2015）、傅骏（2015）、王晓慧和胡金平（2011）等。其中，陈宝泉（2015）提到，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诞生了第二代留守儿童^[12]。潘璐、叶敬忠（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家庭观念等会直接影响新一代留守儿童的发展，而且目前尚未对新一代留守儿童展开系统性研究，但是可以预测代际循环、代际传递是导致留守二代不断形成的重要原因^[13]。林寒（2016）指出，由于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已经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模式，导致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也将面临父辈们曾经历过的留守问题^[14]。王晓慧、胡金平（2011）调研发现，“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留守儿童的父母以前就有过留守的经历”^[15]。他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扩展“问题范式”下留守儿童研究的新领域，而且留守儿童的分代问题是未来研究的重点议题，即和农民工的分代差异一样，留守儿童也进入了“新生代”范畴，不同代别的留守儿童在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16]。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以下代表性观

点：其一，第一代留守儿童和第二代留守儿童具有不同特征；其二，学术界的重视程度不足；其三，存在代际循环、代际传递的可能。

2. 在留守儿童研究方面

首先，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依旧严峻，呈现出规模大、分布广等特点。在规模方面，根据民政部2018年最新公布的数据可知，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区域分布方面，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总数为76.5万，安徽73.6万、湖南70.0万、河南69.9万、江西69.1万、湖北69万和贵州56.3万，以上为排名前七的省份，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9.7%。在监护情况方面，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4%的留守儿童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在性别差异方面，男孩占54.5%，女孩占45.5%。在年龄分布方面，6~13岁的留守儿童规模最大，均超过50%^[17]。其次，留守儿童面临精神健康（心理）、教育、犯罪、社会救助、自杀等问题。在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卞桂平、焦晶（2010）认为主要存在消极依赖、自我封闭、唯我独尊和放任自流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村教育等渠道来重塑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18]。周宗奎、孙晓军等人（2007）认为，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等方面，应当加强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19]。卢利亚（2016）认为，主要表现为自卑孤僻、抑郁焦虑、敏感冲动和偏激叛逆等多种心理症状的交织，是由家庭关系的畸变、关爱服务的粗放、城乡发展的失衡、空间正义的缺失、人的价值迷失等因素导致的^[20]。在教育问题方面，有学者强调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当前城乡分化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错综复杂，家庭分离、学校监管不力等是导致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需

要有一个持续、系统的解决方案^[21]。在犯罪问题方面，有学者认为，随着留守儿童犯罪案件的增多，呈现出低龄化、低文化、财务型犯罪为主、团伙犯罪居多和反复性等特点。在社会救助问题方面，有学者强调，留守儿童享有请求政府依法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陆士桢等（2013）认为，需要尽快完善相关体系，为留守儿童提供制度保证^[22]。张梓英（2014）提到，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留守儿童救助的重要力量，必须保障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深入开展留守儿童救助工作^[23]。在自杀问题方面，李光友、陶方标（2009）调查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14~16岁留守儿童心理发育有一定影响，在自杀意念方面和同年龄组无父母外出儿童相比有明显差异^[24]。张素凤（2017）认为，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反映了我国农村基层救助力量薄弱等问题^[25]。最后，需要采取多元合作的模式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大部分学者强调，留守儿童是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和社区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进而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环境。

3. 在留守二代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方面

梁宏（2011）提到，“虽然当年的流动或留守儿童未必全部‘子承父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但是，绝大多数的第二代农民工必然拥有留守的人生经历”^[26]。汪建华、黄斌欢（2014）调研认为，有过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27]。周汉平（2013）提出，留守儿童次生于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变决定于农民工分化，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前提在于农民工的消解^[28]。苏涛、张明等（2013）认为，制度因

素不是唯一影响农民工选择子女是否留守农村的因素，更多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结果^[29]。林寒（2016）认为，面对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这一时代背景，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无力摆脱“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而且这样一种代际循环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30]。

4. 在“×二代”现象方面

目前，“富二代”“官二代”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都被纳入“×二代”的范畴。金诚（201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留守经历意味着其父辈就有过流动的经验积累，这对于留守儿童的发展而言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在就业和生活等领域可以起到特定作用^[31]。邓志强（2013）提出，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二代”的社会流动机制呈现出新的特征：代际流动的继承性不断增强，代内流动的流变性不断弱化，青年群体存在阶层固化的情况^[32]。梁宏（2011）认为，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农民工子女选择留守还是流动是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他们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33]。顾辉（2014）提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和健康、教育、社会（政策）排斥、生活环境、素质（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晏荣（2011）强调，“×二代”现象表明社会分化已经较为明显，社会阶层边界已经初步形成并有固化的趋势^[34]。田丰、静永超（2018）结合“工之子恒为工”议题对中国城市社会流动和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非对称性效应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35]。可见，阶

层固化、代际传递仍然是“×二代”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调查点——四川Q县A村概况

笔者利用2018年7~8月参加中国农业大学“百名师生乡村振兴系列调研”活动的契机，在四川省Q县A村展开了相关调研，并寻找相关的典型案例进行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留守二代、普通留守儿童、留守二代监护人、村干部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家庭状况、心理情感状况、留守经历、和父母的关系、学习情况、休闲生活等。最后，通过整理相关录音、访谈资料等，尝试分析留守二代现状、特点和原因，并探讨相应的发展路径。

1. 村庄概况

Q县属于西部典型的农业小县，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幅员386.8平方公里，辖10个乡镇，人口19.71万，其中农业人口16.25万，占全县人口的82.4%。儿童3.26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6.5%。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4.7万人，留守儿童8118人，占全县儿童的24.9%。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6624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总数的40.1%。此次调查点位于Q县A村，该村因“湖广填四川，移民安家点”而得名，位于H镇西南，距县城12公里，距H镇5公里，共4.5平方公里，总人口2008人。其中，18~59岁的男性516人、18~59岁的女性466人、外出务工650人、留守妇女165人、14岁以下的儿童451人、留守儿童158人。

2.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由表1可知，调查对象SRX长期处于留守状态，属于典型的留守二代，调查对象WD已经摆脱了留守状态，属于曾经的留守二代，

表1：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	基本情况
SRX	女	10岁	小学五年级	爷爷和父亲长期在成都打工，父亲曾有过留守儿童经历，2010年父母离异，由生活在村里的奶奶抚养和照顾
WD	男	8岁	小学三年级	父亲和母亲童年时均有过留守经历，WD曾短暂经历过留守经历，主要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父母选择回村里工作，他于2015年结束了留守儿童状态
WYB	女	13岁	初中二年级	和奶奶在家，爸妈离婚，爸爸再婚，长期在外打工

衍生的重点访谈对象及其编码：1.S1：SRX奶奶 2.W1：WD妈妈 3.W2：WYB堂姐 4.Y：县妇联主席

调查对象WYB属于普通的留守儿童。因此，可以对三位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及其相关群体展开访谈，重点分析留守二代的现状、特点和产生原因等内容。

四、具体分析：留守二代的现状、特点和原因

1. 发展现状：留守二代的4个访谈片段

片段1：互联网和留守儿童

①互联网时代，我和父亲有着相似却不同的童年遭遇。

SRX：爸爸说他们小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多玩具，而且现在爸爸还给我买了电话手表和手机，当然手机主要是被奶奶管着。我还有自己的微信，我可以给爸爸发视频。

②网络：有时是我的一个好友，有时是我一个损友。

WYB：很多时候会把QQ当成一个很好的空间，记录我的想法，也可以和那些好朋友们分享我的想法。

WYB：考试考过最后一名，当时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最后一名。为什么要纠结呢？老师没有批评我。玩手机把成绩玩差了，我是那种玩不得手机的人，玩了之后思维就被禁锢了。半夜都在玩手机，在学校的时候半夜也玩，如

果父母看到我这样会打我。

SRX：我有自己的微信，是爸爸帮我建的。我喜欢拿手机来听音乐，我喜欢TFBOYS，还有鹿晗。奶奶很多时候不明白我们的世界，每天就知道要求我们学习。

从上述访谈可知，SRX为典型的留守二代，她在一定程度上复刻（重复）着父辈的留守经历，有着和第一代留守儿童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留守儿童的境遇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互联网使得留守二代的生存环境更为多元，远程聊天、视频的便利性，改变了以往只能够依赖于线下见面的情况。应当说互联网跨时空的特征促使农村留守问题在某些方面得以缓解，在提升该群体的抗逆力方面也发挥着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部分留守儿童沉迷于网络，影响学习，或者是在互联网当中形成自我封闭的情况。

片段2：留守儿童和内心世界

①爸爸在我心中的印象已经坏了，我不愿提及他、她和他们。

WYB：爸爸在我心中的印象已经坏了，所以我有点儿自暴自弃。我知道他很辛苦，但是他的形象已经固定化了，我没办法改变，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爸爸生病了，我想关心他，

但是不敢去表达。

SRX：你能不能别问他们了，我不知道他们。我不想聊，尤其是她。

WYB：我恨她，恨她不要我们。

②你在触碰我内心的茎，别人越关心我，我就越想哭。

WYB：别人越关心我，我就越想哭。

WYB：平时和父母和奶奶有矛盾，我不会直接和他们冲突，只是在心里记恨而已，不会说出来。我觉得我和他们的距离很大，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从来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也说不出来的。

WYB给笔者留言：你的每一句话都有一种魔力，能让人感情融入。你触碰我们内心的茎，知道吗？我想压住自己的情绪，完全压不住。

结合上述资料来看，父辈早期的形象在部分留守儿童的心中已经固化，这造成了他们对父母的不理解。还有不少的留守儿童尽管内心对父辈有着多种类型的关怀和关心，但是由于不善于表达，或者是由于中国人本身特有的内敛等原因，导致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将内心想法及时告知父母。因此，也导致父辈形象在留守儿童的头脑中变得根深蒂固。而且，有部分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变迁（比如父母离异）加剧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和成见，甚至说，逐渐演变成一种恨。此外，部分留守儿童时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设置禁区，很多问题都不愿意去面对。

片段3：留守儿童和代际传递

①外出打工和学籍问题：多少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S1：SRX的爷爷那会儿打工出去了，她爸爸(SZJ)在家一直念书，1997年考上的中专。他那会儿就是不太专心，因为没人管，所以成绩不是很好。她爷爷现在快70岁了，她爸快

40了，都还在外面打工，恼不恼火，所以重点就是这个孙女了，害怕她以后也和她爸爸一样。

S1：我儿子SZJ 1981年生的，他也没有个工作，读了个中专出来，现在土地也让人收了，所以就在成都到处跑，不知道他搞啥子。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固定工作。有的时候做点儿生意还倒赔。现在（有）中专学历（的人）多得很，所以他主要也是打零工。

S1：之前，她爸爸想接过她去城里读书，但是现在学籍转不过去。而且住得也不方便。她爸也太懒了，根本管不上。我侄女的小孩去到城里，读了几天，还交了很多借读费，学籍还是转不过去，最后又回来了。

②我不愿让自己的小孩成为留守儿童

W1：我老公是自由职业，搞运输的，帮人运沙子，也开挖掘机。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成都开了一个小铺子卖皮鞋，赚了点钱。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回到Q县工作，在妇女儿童促进会。之后考上了社区网格员（注：类似社会工作者），负责社区治安和民生服务。2016年，村代会上我被推选为村妇联主席，之后又成为村支书，就一直住在乡下了。孩子早上送去县城，下午又从县城接回村子。虽然很辛苦，但是真不想让他成为留守儿童。

从以上访谈可知，父辈的工作对下一代的职业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有不少会选择继续进城务工，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因此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也导致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将和父辈一样面临着留守农村的问题。而且，尽管第二代农民工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且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但是面对户籍限制、农村土地没收等问题，“回不去的农村”导致外出打工成为他们的一种无奈选择。此外，根据访谈对象W1的回答可知，相较于经济情况一般的农民工，那些有经济

基础、具有相对较多资源的父母有能力选择自己子女是否留守。访谈对象W1由于长期从事妇女、儿童方面的工作，相较于一般的父母有更强的妇女、儿童权利观念，会发出“我真不想他成为留守儿童”的感慨。因此，在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过程当中，资本、社会支持网络在其中占据重要角色，更为直接的要素就是父母的职业、家庭背景等。一个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采取特定的途径对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问题加以扭转，进而避免自己的子女成为留守二代。

片段4：留守儿童和赋权、增能

①妇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Y：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件事应该和能够做得更好的，就不会因为资金不足而不去做。Q县妇联之所以能够做这么多事，我觉得与有机遇、与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A村儿童妇女活动室也是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办起来的，一直发挥着作用。

②有，但不常开的村儿童活动室

W2：村里的活动室钥匙在W奶奶（前村书记）那，每天她管着音响和广播，你们大学生没有来的时候，很少开门的。

从上述访谈可知，一方面，妇联在留守儿童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多方合作的形式建设了农村儿童活动室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而为留守儿童进行赋权。但另一方面，农村部分有关儿童方面的基础设施存在有但使用很少的问题，一些公共资源被个人管理和占有，进而导致留守儿童基础设施浪费、闲置的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推进留守儿童公共活动空间的建设和管理，是未来留守二代研究进程中需要把握的重点议题。换言之，如何切实有效地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社会关怀、链接社会资源等途径来为留守二代赋权和增能，是未来我国留守

儿童工作必须继续坚持和探索的内容。

2. 新特征：留守二代的5个发展遭遇

第一，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事实上，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而外出务工大潮广泛兴起于1990年前后。因此，该时期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最高可达30岁，而他们留在农村的孩子——第一代留守儿童大多数已经开始进入学校学习，最小者基本已入小学，稍大者已经进入初中阶段。正如王晓慧、胡金平（2011）所言，大部分第一代留守儿童是在儿童阶段甚至是少年阶段才拥有留守经历的，而在婴幼儿阶段仍然是和父母一起生活^[36]。反观第二代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基本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主要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在该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尚未结婚（成家）就已经在城市务工，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务工后才逐渐考虑结婚，而且大部分在结婚生子后又很快重新回到城市进行务工。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最初年龄有一定差异，也导致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留守二代在襁褓之中（婴幼儿时期）就进入了留守状态。因此，相较于第一代留守儿童，留守二代的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

第二，对父母的认知偏差更为严重。由于大部分留守二代在婴幼儿时期就已经进入了留守状态，而第一代留守儿童基本上是在进入学校后才拥有了留守儿童经历，这样一种差异直接导致了第一代留守儿童和第二代留守儿童在父母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区别。正如前文所言，大部分第一代留守儿童在婴幼儿时期是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依恋期的情感认知基本形成。因此，他们对于父母的形象和认知基本上已经确立，不会存在较大的问题和偏差。而且，回顾我国传统的

留守儿童（第一代留守儿童）研究可知，第一代留守儿童主要在教育、心理、社会化等方面存在问题，而在父母认知方面问题并不明显。然而，留守二代由于所处的境遇的不同，导致该群体在父母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偏差。该群体大部分在婴幼儿时期就遭遇了留守问题，由于婴幼儿时期父母的缺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替代，导致他们心理和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父母的认知方面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第三，情感更为脆弱和敏感。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精神世界、情感生活方面（叶敬忠、王伊欢等，2006）。由于父母的关怀和陪伴较少，与父母的情感沟通也不及时，因而导致大部分留守儿童内心失落^[37]。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主要存在自卑孤僻、抑郁焦虑、敏感冲动和偏激叛逆等心理和情感问题。而留守二代的父辈也曾经经历过留守，因此，他们的情感状态和心理世界也受到父辈的影响，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成年后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留守二代）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时刻受到父辈的心理问题和个人性格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留守二代比第一代留守儿童更加敏感，对情感的依恋程度也更高，而且也更加容易产生偏激、冲动的想法和行为。

第四，生存、发展环境更为多元。陆士桢（2010）曾对第二代独生子女的特点有过充分论述，她认为，他们生活在祖辈、父辈从未经历过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一定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物质态度^[38]。事实上，第二代留守儿童也一样，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第一代留守儿童有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

的高速发展，他们所处的时代更为多元和丰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第一代留守儿童的闲暇活动较少，和外出务工的父母主要依赖于电话、写信等方式，而且呈现出通话时间短、次数少等特点。由于特殊条件的制约，在短短的通话时间中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有一个深入的情感交流和互动^[39]。然而，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电脑、电视等多媒体的普及，使得留守二代的生活更为丰富和充实。就以和父母的沟通联系为例，留守二代可以采取远程视频、聊天等方式与父母进行即时沟通和交流，这弥补了以往第一代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不及时等局限。换言之，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跨越时空的特征，互联网世界具有丰富性和便捷性等特点，促使农村留守问题在某些方面得以缓解，也使得留守二代的闲暇生活不再单调。

第五，抗逆力和赋权有所增强。所谓“抗逆力”是指个体尽管经历显著的逆境或困境但仍能展示出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40]。笔者认为，抗逆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在于个人本身，还依赖于社会赋能。由于第一代留守儿童和第二代留守儿童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能够拥有的资源和借助的力量也有所差异，导致了二者能够获得的社会赋权有着天然的差别。由于社会关注度的增加、国家政策的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留守二代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去改变自身的逆境。因此，留守二代在面对留守困境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实现中断和摆脱。而且，就从父辈所有的资源来看，第一代留守儿童的父母早期为农民，由于进城务工才逐渐成为农民工，而留守二代的父母一开始就是第二代农民工，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因此，对于留守二代的发展能够采取更好的策略。此外，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使留守二代的生活世界更为丰富，削减了留守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总之，新时期我国留守二代的抗逆力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第一代留守儿童。

3. 复杂、阶层、理性：留守二代产生的原因

如果以1993年留守儿童概念的提出为重要分界线，我国留守儿童研究已经开展了25年，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有部分有影响力的图书、著作得以出版，比如《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叶敬忠，2005）、《留守还是流动？“民工潮”中的儿童研究》（吕邵清，2007）、《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叶敬忠、潘璐，2008）、《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1）、《转型期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符平，2013）、《抗逆力：留守儿童研究新视角》（同雪莉，2018）等。此外，从政策法规来看，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等政策、法规^[41]。总之，留守儿童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然而，第二代留守儿童的出现表明第一代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也进一步说明该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及时思考我国留守二代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是该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对于留守儿童形成的原因和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邬志辉、李静美（2015）认为，留守儿童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弱势的“弱势儿童”，主要是由于父母监护缺位、亲情缺失、教育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42]。陶然、周慧敏（2012）提出，需要通过

户籍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等方式来促使留守儿童能够有机会在城市就学^[43]。从留守儿童的现实状况来看，留守儿童的规模庞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西部地方极其严重。而且，正如前文所言，相较于第一代留守儿童，第二代留守儿童问题更为严重，呈现出低龄化特点。即大部分留守二代在婴幼儿时期就已经进入留守状态，而且该群体对父母的认知偏差更为严重，情感也更为脆弱和敏感，更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此外，由于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更为多元，导致我国新时期的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任务也更为艰巨，进而也导致留守二代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

第二，阶层固化和代际循环是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二代”视角来看，第二代留守儿童也符合“×二代”的经典定义，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的延续。对于“×二代”产生的原因，邓志强（2013）认为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二代”的身份、资源、能力等内容受到父辈的影响和制约，而且从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状况来看，目前社会阶层的固化情况愈加明显，存在着所谓的“看得见的天花板”^[44]。而顾辉（2014）、田丰（2018）等人则认为，贫困存在代际传递，由于社会个体受到健康、教育、社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改变目前现状的能力和可能性较小，因此贫困问题极有可能进一步传递给下一代。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结合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和循环的情况，提出了“世袭儿童”等概念，强调留守儿童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导致其子女仍然可能成为留守儿童，即留守儿童之子女恒为留守儿童^[45]。此外，林寒（2016）指出，“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一个农民的生命轨迹和必然



宿命，而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进而导致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成为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46]。而且她进一步认为，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具有普遍性、循环性、破坏性、落后性等特征。总之，留守二代的出现也受到阶层固化和代际循环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这样一种影响将会长期持续下去，难以快速消解。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和现实境遇是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理性选择（理论）是解释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农民工面临的诸多现实境遇和挑战是他们最为主要的行动逻辑。林寒（2016）认为，由于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农村就业机会较少，收入较低，而且缺乏资金、技术支持，难以在农村实现创业。受到上述现实因素的束缚，外出务工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生产和发展的唯一出路^[47]。梁宏、任焰（2010）认为，父母的理性选择是导致儿童留守或流动的直接性因素，其中，父母的年龄、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决定农民工子女是否成为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的关键性内容，而且这样一种理性选择完全符合人口迁移中的“推拉理论”^[48]。换言之，农民工在城市有较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居住场所、农民工子女能够有在城市就读的机会是促使农民工子女成为“流动儿童”的重要条件。而反之，农民工则会基于理性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使得他们成为留守儿童。对于留守二代的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亦是如此。留守二代父母的理性选择是造成该群体留守农村的直接原因，由于社会阶层的固化，城市生存压力的加剧等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将自己孩子留在农村，交由亲人照顾。总之，留守二代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诸多现实境遇是导

致当前问题更加复杂的直接原因，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研究。

五、结束语

正如潘璐、叶敬忠（2014）所言，“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新一代留守儿童展开系统性研究，但是可以预测代际循环、代际传递是导致留守二代不断形成的重要原因”^[49]，因此，第二代留守儿童问题是未来我国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传统的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方面相互合作。因而对于留守二代问题首先需要延续传统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策略，从完善国家制度，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多元互动和监督的体制着手。

另外，笔者认为要想彻底解决留守二代问题，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进得来的城市”和“回得去的农村”。所谓“进得来的城市”就是指农民工能够实现市民化，能够拥有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城市获得一样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让留守儿童可以进城接受教育、享受城市生活，是建设“进得来的城市”必须做的重要事情。而所谓“回得去的农村”是指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在农村有一样的就业、创业机会，能够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陪伴子女，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总之，要想促使“进得来的城市”和“回得去的农村”得以实现，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户籍、学籍等相应的制度改革。

最后，学术界应当重视第二代留守儿童问题。目前，相关议题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当中，而在学术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留守二代”“留二代”“第二代留守儿

童”等相关概念迟迟没有被学术化。然而，留守二代现象在未来会是一个较为普遍且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因此，学术界需要对于该现象加以重视，并进行追踪式研究。❶

(本文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百名师生乡村振兴系列调研”活动的资助以及博

士生导师叶敬忠教授的指导。此外，本文初稿曾在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青少年研究论坛宣读，并获优秀论文三等奖。特此致谢！)

萧子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弓立新

参考文献：

- [1]陈雪娇,耿春雷.留守儿童3.0[J].社会与公益,2012(6):12-17.
- [2][6][37]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75-80,82.
- [3]东方网.近六成年轻务工者曾是留守儿童[EB/OL].央视网,http://news.cntv.cn/20120601/104362.shtml.
- [4][14][30][46][47]林寒.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2-89,135.
- [5]上官子木.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J].父母必读,1993(11):16-17.
- [7]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4(10):15-18,82
- [8]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
- [9]萧子扬.关注“第二代留守儿童”现象[N].中国人口报,2018-11-28.
- [10]李莎.摸底留守儿童,更要重构乡村[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6(4):7.
- [11]林君.村里的“留二代”[EB/OL].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jx,2015.rb/system/2015/06/21/013977656.shtml.
- [12]陈宝泉.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绕不开父母之责——访北师大心理所所长边玉芳教授[J].教育家,2015(9).
- [13][49]潘璐,叶敬忠.“大发展的孩子们”: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困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2(3):2-12,188.
- [15][16][36]王晓慧,胡金平.“问题范式”下的留守儿童研究及其拓展[J].教育学术月刊,2011(6):14-17.
- [17]民政部.图表: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D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gk/tjtbs/201809/20180900010882.shtml
- [18]卞桂平,焦晶.农村留守儿童精神世界:困境与多方协同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0(4):171-173.
- [19]周宗奎,孙晓军,范翠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与对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9-125,160.
- [20]卢利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症候探析[J].求索,2016(11):57-61.
- [21]范先佐,郭清扬.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1):55-64.
- [22]陆士桢,孙冉冉.儿童社会服务组织与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救助[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3,23(6):21-25,64.
- [23]张梓英.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救助农村留守儿童研究[J].特区经济,2014(6):159-160.
- [24]李光友,陶方标.14~16岁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及自杀倾向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9,25(8):905-907.
- [25]张素凤.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不适当及应对——由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引发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1):90-95.
- [26][33]梁宏.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4):18-29.
- [27]汪建华,黄斌欢.留守经历与新工人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J].社会,2014,34(5):88-104.
- [28]周汉平.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以安徽枞阳DS村为例[J].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3,30(11):14-19.
- [29]苏涛,张明,胡静.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的变化初探[J].江汉论坛,2013(3):120-124.
- [31]金诚.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群体与代际差异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7(7):216-228.
- [32][44]邓志强.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J].中国青年研究,2013(6):5-10.
- [34]晏荣.“X二代”现象:制度壁垒与社会排斥[J].中国青年研究,2011(7):5-8.
- [35][45]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和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8(6).
- [38]陆士桢.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时代性特征[J].少年儿童研究,2010(22).

- [39]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6(1): 57 - 65.
- [40]同雪莉.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研究[D].南京大学,2016.
- [4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42]邬志辉,李静美.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65 - 74.
- [43]陶然,周慧敏.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J].管理世界,2012(08): 68 - 77.
- [48]梁宏,任焰.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0(3): 57 - 65.

(上接第 71 页)

儿童画上,这样的评价将失去儿童美术教育意义。评价儿童画,要注重儿童绘画过程的评价,关注儿童在绘画中语言发展、情绪的变化以及情感的表达,注重儿童的绘画热情、绘画兴趣和努力程度,因为儿童画的教育目的是育人。儿童画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作业,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教育者的态度与评价对儿童会有相当的

影响,如果评价不当,可能会打击、挫伤儿童绘画的兴趣,甚至影响到儿童创作、创新的积极性。

[基金项目: 湖北工程学院科研项目 (201807)
“幼儿守恒认知能力的调查研究”]

刘翠霞: 湖北工程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孟娜

参考文献:

- [1][2][3][5][德]罗泽·弗莱克-班格尔特.孩子的画告诉我们什么——儿童画与儿童心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 122.
- [4]蒙台梭利.蒙台梭利经典教育原著[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 [6]黄雯婷.儿童画内容解读之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 [7]杜卓红.罗恩菲尔德美术教育在培养儿童创造力中的应用[J].素质教育论坛,2011(13).